

从积极到无奈:梁思成“大屋顶”建筑理念的转变

李喜所,胡志刚

摘要:建国初期,在设计建造民族形式建筑过程中,“大屋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对于“大屋顶”问题,建筑学家梁思成一度表现出强烈的学术探索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其学术观点亦发生显著转变,从严厉批评转为部分接纳,并从学术层面上积极寻找有效的实现路径。1955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大屋顶”自身的问题,梁遭到严厉批判,成为建筑学界“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错误”的代表。重压之下,梁对“大屋顶”的态度再次转变,在自我批判的同时亦明确否定了“大屋顶”建筑。

关键词:梁思成;大屋顶;建筑理念;民族形式

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设计建造具有“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建筑的过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一改以往对“大屋顶”式中国建筑的严厉批评态度,转而重新审视其价值并予以肯定。遗憾的是,随着政治形势的突变,梁思成建筑理念的这一转变不仅没能使其获得更宽广、自由的学术平台,反而将其拖进政治、学术双重批判的漩涡,成为“大屋顶”的代名词。面对重压,梁思成亦再次转变其对“大屋顶”建筑的态度,公开批判了自己在“大屋顶”建筑研究和推广上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出自建筑学界,将其作为建筑史领域的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①本文试图跳出建筑史研究窠臼,以梁思成学术观点和个人命运的悲剧式转变为中心,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讨论这一问题。

一、政治的需要:关于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

建筑作为技术和艺术的融合体,“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人们“修造建筑物有着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目的,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和实用的原因”。^{[1](P9)}建国初期,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经济形势的好转,从政治领袖到普通公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显著增强,对于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强调和追求也更加迫切,并逐渐从文化艺术领域延伸到科学技术领域。设计建造民族形式的新建筑,很快便成为新中国建筑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筑设计思想划清界限,用中国风格和形式设计新建

收稿日期:2013-07-01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ZL10-463)。

作者简介:李喜所,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志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城建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① 围绕这一问题,建筑学界在195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期集中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形成了两次讨论的高潮。第一次主要为配合批判建筑设计中以“大屋顶”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需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第二次则突出了学术争鸣的特点,比较客观地论述了建筑设计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并对梁思成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应若:《谈建筑中“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口号》,《建筑学报》1981年第2期;袁镜身:《回顾三十年建筑思想发展的里程》,《建筑学报》1984年第6期;戴念慈:《论建筑的风格、形式、内容及其他——在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建筑学报》1986年第2期;王世仁:《民族形式再认识》,《建筑学报》1980年第3期;陈世民:《“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建筑学报》1980年第2期;陈重庆:《为“大屋顶”辩》,《建筑学报》1980年第4期;陈蛟:《评建筑的民族形式——兼论社会主义建筑》,《建筑学报》1981年第1期;曹庆涵:《建筑创作理论中不宜用“民族形式”一词》,《建筑学报》1980年第5期;沈浩:《对建筑“民族形式”提法的几点意见》,《建筑学报》1984年第5期,等等。

筑,不仅成为考验建筑师学识的技术问题,更成为体现建筑师思想觉悟和阶级立场的政治问题。

此外,这一时期,援华的苏联专家对于民族形式的积极倡导亦不可忽视。大批援华的苏联专家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下,他们基本上主导了学术界的话语权,其理论和实践对当时乃至之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建筑学界,一个典型的表现,即是当时在苏联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倡导“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设计思想被苏联专家带到了中国。他们要求中国新建筑的内容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在外形上则要充分展示中国的民族形式,将欧美各国盛行的“世界主义”风格建筑视为抹杀民族特色的垃圾之作,坚决予以排斥。1949年9月,以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苏联市政专家组来华指导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阿布拉莫夫第一次与中方专家见面就提出要搞“民族形式”,并说要像西直门那样,还画了箭楼的样子以说明他的意思。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在其所作的北京市发展计划报告中,专门强调了新中国建筑设计,尤其是行政机关房屋设计中的民族形式问题。^①

对于向苏联学习,中央政府态度鲜明,明确要求建筑学界“必须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特别是向苏联专家学习”^[2]。梁思成曾专门撰文谈及此事,他说:“在苏联专家耐心、友好的帮助下,新中国的建筑师已开始端正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思想,我们在今后要将基本建设引导上正确的方向。”^{[3](P153)}

二、彰显民族性:“大屋顶”建筑的兴起

早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便开始兴起建造民族形式建筑之风,而率先采用民族形式进行现代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其设计作品则主要是具有西方教会背景的学校、医院甚至教堂建筑,四五层高的楼房,下面是西式结构和外形,顶部设计成凹型弯曲的宫殿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此来体现中国风格,区别西式建筑。北京、成都、济南等地陆续建造了一批这样的楼宇。来华的西方建筑师试图以建筑外观上的中国化减

少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阻力,可谓用心良苦。到了30年代前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实施文化本位主义,以中国建筑师为主,建造中国固有之形式的新建筑之风日益兴盛,其建筑实例主要以政府机关及公共事业建筑为主,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和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探索。抗战爆发,经济萧条,建筑活动锐减,建筑界对民族形式的探索与实践亦进入低谷。

回顾抗战之前的民族形式建筑,不难发现,“大屋顶”风格的建筑占了主体。这一点,在西方建筑师设计的中国式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大屋顶”,其实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高高耸起的宫殿式的屋顶的统称。与其他体系建筑不同的是,“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被视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3](P181)}

虽然“大屋顶”风格突出的“中国式”建筑在抗战之前颇具影响,但在中国建筑学界,很多建筑师并不认同这种设计风格,梁思成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中国式”建筑,梁思成直言其理论和设计建造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既曲解了中国建筑的精髓,又忽略了现代建筑的长项,“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4](P235)}。除去技术上的问题外,梁思成还指出:“大屋顶”建筑“糜费侈大”,“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5](P379)}与梁思成同时代的建筑学家童寯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批评当时流行的“中国式”建筑,“不伦不类,殊可发噱”^{[6](P111)}。虽然梁思成并未就“中国式”建筑提出成熟的设计范式,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对于“大屋顶”建筑的看法依旧没有大的改变。1950年1月22日,梁在营造学研究会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于“建筑的民族形式”的看法,他指出:“大屋顶”建筑“不伦不类,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胸前挂一块绶子,脚上穿一双朝靴,自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3](P57)}

新中国成立之后,设计建造民族形式新建筑之风迅速升温,但在短时间内要弄清楚什么才是体现民族形式的新建筑,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事实上,对于建筑的民族形式这个表述非常抽象的概念,虽然建筑学界的争论很热烈,但始终未能

^① 参见1987年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辑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中的《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现藏于天津城建大学图书馆。

形成统一的认识。基于此,50年代初期,一度沉寂的“大屋顶”建筑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毫无疑问,这类建筑具有较为显著的民族特色和风格。在没有成功范例可遵循的情况下,以备受争议的“大屋顶”来体现新中国建筑的民族性,显示出了建筑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一命题解读的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事实上,置身于建国初期政治色彩浓厚的学术语境下,建筑学界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科学、全面的认识的。对此,梁思成曾坦言:“创造我们的新建筑。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老实说,我们全国的营建工作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去做。”^{[3](P55)}形势迫人,就在建筑学界积极思考、探索较为成熟的、体现民族性的建筑设计方案的同时,各地开始陆续兴建一批以“大屋顶”为主要标志的、仿古色彩浓淡不一的新建筑。这其中,不仅有展览馆、大会堂、剧场,还有大量的宾馆、办公楼、教学楼,甚至还有很多宿舍楼,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形成了建国之后第一次兴建民族形式建筑的高潮。

三、从反感到接纳:梁思成的转变

前文已经提及梁思成在建国之前对“大屋顶”的态度,不难看出,他是持反对意见的,甚至是颇为反感的。梁思成在建筑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较少,但从为数不多的设计实例来看,虽然或多或少融入了一些传统的元素,但总体上,功能、结构、形式统一,符合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则,其中尤以30年代设计建造的原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和地质馆为代表。

在批评“大屋顶”建筑的同时,梁思成对于建筑师们为中国创造带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的努力也给予了一定的鼓励,称这种尝试虽然总体而言是不可取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精神的抬头”,有其积极意义。^{[5](P379)}如何推陈出新,设计具有民族形式的建筑,建国之前,梁思成并未作深入的研究,亦未提出明确意见。但在推陈出新的路径选择上,梁思成明确指出:“创造新的既须要对于旧的有认识;他们需要参考资料,犹如航海人需要地图一样。”^{[4](P236)}基于这一思想,从30年代开始,梁思成领导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对之前调查搜集到的古建筑照片“分门别类——如台基,栏杆,斗拱等——辑为图集,每集冠以简略

的说明,并加以必要的插图,专供国式建筑图案设计参考之助”^{[4](P236)}。值得注意的是,收集整理参考资料,开展专门研究,是梁思成对待这一问题的一贯主张。即便在50年代初期,梁思成对“大屋顶”建筑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之际,他还在号召建筑界同仁开展关于民族形式建筑的研究,同时,尽量搜集、整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梁思成对于“大屋顶”式建筑态度的转变始于1950年代初期。如果说建国之初的一段时间,梁思成还是在理论层面领悟苏联专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的理念,到了1954年,梁思成则完成了基本的理论建构和初步的实践示范,实现了思想观念和学术观点的转变。其标志有两个方面,一是摒弃坚持多年的西方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全面接受苏联的设计思想;二是系统阐述了以“屋顶”和“斗拱”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建筑的九大基本特征,称之为中国建筑的“文法”^{[3](P179-184)},并公开发表了两张想象中的体现民族形式的建筑图。

从1951年七八月开始,梁思成多次批判自己一贯认可的“国际式”建筑及其所体现的现代建筑设计风格,将其视作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一个月之后,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梁思成又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了详细的汇报,“痛悔过去误信了割断历史的建筑理论”^{[3](P123)}。

对于民族形式建筑的实现方式,梁思成希望能从传统建筑元素中找到突破口。他认为:“‘斗拱’和它们所承托的庄严的屋顶,都是中国建筑上独有的特征。”^{[3](P137)}不过,作为木结构建筑的重要部分,斗拱显然已不适合现代建筑,中国传统特征浓厚的屋顶是否可以与现代建筑结合呢?带着这个问题,梁思成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对于“大屋顶”的批评。他说:“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传统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3](P193)}在他看来,如果说以往自己对“大屋顶”的批判是因为其设计上未抓住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只是单纯的形式上的捏合,就像是穿西装戴顶戴花翎一样,那么,如果能把握好传统屋顶与现代建筑结合的“度”,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或许可以走出一条探索、实践民族形式的新路子。基于这种想法,1950年,梁思成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新宿舍,开始尝试用

传统风味十足的大屋顶来表现中国风格。由于新建宿舍造型优美,既方便实用,又与所处的中南海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受到广泛的赞誉。1954年,在中央科学讲座上,梁思成特意设计了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作为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一种方式的建议。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高约35层的高楼。他希望用这两张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二是“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3](P233-234)

四、学人的悲剧:梁思成的再次转变

在“大屋顶”问题上,梁思成打破了多年形成的观念,由批评转变为接纳,但接踵而来的问题很快使其陷入自相矛盾的漩涡,加之突如其来的大批判,其对“大屋顶”的态度也随之再次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大屋顶”式建筑的应用范围。梁思成主张用传统的形式和“文法”来体现建筑的民族形式,并非想为全国树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在中南海等特定的环境中,新建筑可以带有浓厚的仿古风格,一般的建筑物,如宿舍、办公楼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至于满足人们艺术和美观的要求只能是比较次要的。他希望“大屋顶”建筑能在建筑界引起广泛的争鸣,继而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更多、也更成熟的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方案。毕竟“大屋顶”建筑在费用上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平顶建筑,而这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的新中国来讲无疑是难堪重负的。但出乎梁思成的意料,正苦于缺少成功范例可循的建筑学界很快就将“大屋顶”无节制地推行开来,一时间,仿古建筑大量出现。

其次是“大屋顶”式建筑的推广问题。对于推广“大屋顶”,梁思成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其实践举措也是如此。梁坦言,自己“从事多年的古建筑研究,对古老的建筑形式有很深的偏爱,认为人们反对大屋顶,是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历史修养,有‘崇洋’思想”[7](P271)。事实上,他对于“大屋顶”态度的转变以及对于传统建筑形式的偏爱,势必会对建筑学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梁曾多次提及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大屋顶”式建筑建造

维护费用高、设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显然未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曾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并一度主持该委员会审批图纸的工作,“设计符不符合‘三段’特色,难免有时就成为批不批准的原因”[8]。对于北京旧城区的建设,尤其是长安街两侧的建筑,梁思成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也曾经明确建议要“按照民族形式设计”[3](P122-124)。后来举国批判“大屋顶”之际,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便成为揭批梁思成的重要依据。彭真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即不点名地批评道:“主管建筑部门的有些人,到处滥用职权,对建筑形式任意干涉,强迫人家盖大屋顶,或强迫人家‘这样’‘那样’。”[9]

相比较普通平顶建筑而言,仿古建筑的建造成本无疑会高出很多,这与当时中国的国力是不相符合的。中央民族学院校舍是较早采用民族形式建造的建筑,由于施工工艺复杂,建造和维护费用都较普通的平顶建筑高出很多,其中1951年开工的13,000平方公尺建筑的建设成本高了18%,每年的维修费用超过1,000元。[10]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不少的基本建设工程还没有规定适当的建设标准,而有些城市、机关、学校、企业又常常进行一些不急需的或者过于豪华的建筑,任意耗费国家有限的资金。”[11](P10)与此同时,苏联建筑界也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迭而转变了风向。1954年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浪费和虚假装饰问题,号召苏联建筑界“要和这种建筑艺术脱离建筑中重要问题的现象进行斗争”[12](P10-51)。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在斯大林时代被奉为正统,且对新中国建筑产生重大影响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设计理念遭到苏联官方的抛弃。苏联老大哥的态度转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建筑界。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开始集中批判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13]。批判就要有靶子,尤其是这种政治批判。作为建筑学界的权威,又是建国初期探索、研究建筑的民族风格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梁思成无疑是首选。批判的矛头很快集中到梁思成身上,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急剧升级。

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

出：“建筑中浪费的一个来源是我们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往往在反对‘结构主义’和‘继承古典建筑遗产’的借口下，发展了‘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在建筑中大量采用成本昂贵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沥粉贴金、大屋顶、石狮子的形式，用大量人工描绘各种古老的彩画，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14]以此为开端，批判全面展开。在之后的近三个月时间内，《人民日报》专门开辟“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专栏，先后刊发近60篇文章和报道，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揭批各地建造的“大屋顶”建筑及基本建设中出现的浪费现象，还有一部分则是一些曾经设计过仿古建筑或领导过仿古建筑设计设计的专家、领导所作的检查。

中央政治局指定彭真负责，在颐和园畅观堂组织了专门批梁思成的写作班子，并很快写出了二三十篇批判文章，准备随时向“反动权威”梁思成发动进攻。^[15]《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也收集了近百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所幸中央有关领导考虑到梁思成的问题终归主要是学术思想问题，一旦集中发文批判，很容易将梁思成与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人等同起来，就如梁思成自己所言：“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16]最终，中央决定不公开发表这批文章。尽管《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党的报刊没有刊发点名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但《建筑学报》、《学习》、《新建设》、《文艺报》等刊物还是陆续发表了一批批梁的文章。^①

面对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批判，梁思成选择了“认罪”，对自己关于“大屋顶”建筑的想法和做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和深刻剖析，与“大屋顶”彻底划清界限。1956年2月3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梁思成作了公开检讨，转天的《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检讨的全文。梁思成这样总结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所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

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17]

五、结 语

对于“大屋顶”建筑，梁思成态度的一变再变，显然是政治因素和学术探索双重作用的结果。早在1957年，建筑界同行张开济即指出：“在解放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凡是有人对于某些苏联经验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也不无可取，那么‘立场观点有问题’，‘思想落后’甚至于‘思想反动’等等一堆大帽子都会扣到他头上去的。于是有些人明知有问题也不敢说，有些人只好将错就错，建筑界也不例外。”^[18]在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过程中，梁思成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学术认知上，由于对“民族形式”的狭义理解，因而，他过于强调“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3](P233)}。如果当时的学者们能够在宽松和自由的政治和学术语境下探讨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或许梁思成能跳出“大屋顶”、“三段式”、“五大块”等古代建筑的范式，在更宽广的视域中找到民族形式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的路径。

关于“大屋顶”式建筑与梁思成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讲，梁提倡“民族形式”，更多的“是学者式的而非行政式的，主要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和参加评图讨论。是讲道理、学术性的，而非如以后某些人的硬性规定、行政命令式的做法”^{[19](P80)}。对于一哄而上的大量仿古建筑，梁思成尽管肯定了其中包含的对于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探索精神，但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对于其设计水平更是不满意。他坦言：“50年代初所盖的‘大屋顶’建筑，却很少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以至于他对“大屋顶”越来越灰心，甚至于后来“对‘大屋顶’这一古代的建筑造型，是否适用于现代新建筑发

① 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干、高汉：《〈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商榷》，《文艺报》1954年第16号；《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建筑学报》1955年第1期；《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新建设》1955年12月号；何祚庥：《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学习》1955年第10期；刘敦桢：《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建筑学报》1955年第1期；卢绳：《对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几点批判》，《建筑学报》1955年第3期；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和民族形式的》，《建筑学报》1955年第2期；王鹰：《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建筑学报》1955年第2期。

生了疑问。”[7](P271)为此,他一再提醒全国的建筑界同仁:“设计民族形式的建筑时,不是找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摹仿一下,加一些民族形式的花纹就可以成功的。在设计工作中应用民族形式,需要经过深入和刻苦的钻研。”[3](P197)

梁思成不是政治领袖,他不可能具有一呼百应的权威,50年代初期特定的政治语境和盲目地

学习苏联的风气才是导致“大屋顶”建筑盛行的主要原因。虽然梁思成一再表示“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17],显然,他的自我批判并非在建筑理论上的悔过,而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对于仿古建筑造成的浪费现实面前的自我反省。“大屋顶”问题始终是一个令梁思成纠结的问题,其观点也显得模棱两可。

参考文献:

- [1] 迪耶·萨迪奇. 权力与建筑[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2] 为确立正确的设计思想而斗争[N]. 人民日报,1953-10-14.
- [3]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五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4]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六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5]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三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6] 童寯. 童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 [7] 林洙.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8] 汪季琦. 回忆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J]. 建筑学报,1980(4).
- [9]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N]. 人民日报,1955-02-22.
- [10] 顾雷. 中央民族学院建筑中的浪费[N]. 人民日报,1955-03-29.
- [11] 周恩来. 政府工作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 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重要文集[C]. 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
- [13] 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 揭发浪费和质量低劣现象[N]. 人民日报,1955-03-03.
- [14] 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N]. 人民日报,1955-03-28.
- [15] 于光远. 忆彭真二三事[J]. 百年潮,1997(5).
- [16] 梁思成. 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N]. 人民日报,1957-07-14.
- [17] 梁思成. 梁思成的发言[N]. 人民日报,1956-02-04.
- [18] 北京城市建设工作有哪些问题 市设计院建筑师在市委座谈会上各抒己见[N]. 北京日报,1957-05-20.
- [19] 高亦兰. 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C].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From Energetic to Helpless: Shifts of Liang Sicheng's Architectural Concep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rved Roof”

LI Xisuo, HU Zhiga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rved Roof” became the focus of all side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building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for this issue, Liang Sicheng the famous Chinese architect once showed great consciousness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and keen enthusiasm of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accordingly, with his academic viewpoint having shifted remarkably from sharp criticism to partial acceptance, he had been actively seeking effective realizing ways in an academic level. In 1955, due to changes of political circumstance and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rved Roof” itself, Liang received severe criticism and was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formalism and revivalism in the architectural circle. Under huge pressure, as his attitude to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urved Roof” shifted again, Liang criticized him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decidedly disapproved building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rved roof.

Key words: Liang Siche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rved Roof; architectural concep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